

敌后纪事

· 陈 允 豪 ·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允豪著

敌后纪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福州

敌后纪事

陈允豪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25印张 3插页 115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

书号: 11173·83 定价: 0.65元



作 者

摄于一九四五年

序

离开苏北大平原，已经三十多年了。看了《敌后纪事》，使我又象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我和陈允豪这些来自乌烟瘴气的大后方和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的青年，刚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时候，都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幼稚，但热情，向往革命，富于幻想，好象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对根据地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新鲜的、甚至是新奇的感觉。《敌后纪事》真实地反映了四十年代根据地青年的战地生活，抒发了一个刚进入革命行列的青年的思想感情。不管是老战士还是青年人，读起这本小册子来，都是饶有兴味的。

现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比起我们那个时候来，懂得的现代知识要多得多，议论问题也活跃得多，但对于自己的祖国是在怎样一种废墟上崛起的，对于自己的父兄又是在什么困难条件下战斗过来的，就不一定知道得很多了。当时在根据地里妇孺皆知的“抗币”、“储备券”、“黑白通”、“梅花桩”，恐怕现代青年很少懂得它的含义了。不懂得过去，不能把握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们看看这本小册子，也许比老战士看得更有意义。

通俗、朴实、却又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这本小册子的特点。它记录了发生在四十年代中国农村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幅历史长卷中的一个侧面。它的出版，是值得庆幸的。

项 南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序.....	项 南
敌后纪事.....	(1)
卖鱼郎 (外六篇)	(66)
唐家兄妹.....	(105)
后 记.....	(163)

敌 后 纪 事

踏 上 征 途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们踏上了从上海到苏北的征途，十八人分成三个组，有的人简单地化了一下装，变得“老相”“土气”一点。在外滩上了船，一夜就到了泰兴县属的新港口。新港虽是个很小的集镇，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但驻着日寇和伪警察。日寇住在镇东的一个圩子里，怕新四军打，缩在圩里不敢出来。担任检查旅客的伪警察，被新四军打过好几次，很害怕，都称新四军为“四太爷”。我们这些“洋学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参加新四军去的，但伪警察也不敢仔细盘问。上了岸，在小面馆里吃了阳春面，一个茶房走过来问：“黄桥去，要雇车吗？”他也估量到我们是去那里了。

我的一组是四个人，雇了两辆独轮六合车，车夫也是“心里有数”。从新港到黄桥有两条路，大路是走季家市，小路是走黄家市，季家市驻有日寇，车夫带我们走黄家市。到黄家市就看到新四军的布告，就是说已经到了祖国的自由天地了。

这真是新奇之极，一队“洋学生”通过敌人封锁线，竟这样简单而顺利。仔细一想就会明白领导为什么指定我们在这一

个港口登陆了。我们那个车夫告诉我们，新港这些伪警察，有很多人都是被新四军捉去又放出来的。有一次，有位便衣同志从上海买了很多西药，在港口被两个伪警察查到了，以为是商人，想敲竹杠，那位同志竖起四个指头，伪警察就再也不敢留难，乖乖地让他走了。

显然，我们能顺利地通过封锁线，是新四军同志经过多少次的战斗得来的。

走路也要学习

到了黄桥镇，在抗大招生处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就往古溪镇走。这一段路约五十里，全靠步行，行李放在独轮车上。一起走的有十一个人，都是考抗大的，招生处还派了一位通讯员同志送我们。

开头，大家走得很起劲，一路上唱着歌，还帮车夫拉车子。精神抖擞走了二十里路左右，情形就变了，脚步也快慢不一起来，那位背着步枪、背包的通讯员同志，总是在前面等我们这些空手走路的。为了赶上他，我们几个自认为“身强力壮”的，就跑步赶上去，但跑了一段就更喘不过气来，一下又掉队了。

这位通讯员同志看着我们的狼狈样子，就说：“跑步是不行的。走长路要步子大，保持经常的速度，才不吃力。”的确，他总是迈着大步，稳稳地走着。

走到古溪，已经疲劳不堪了，见到招待所里铺着草的地铺，有的同志倒下来便睡，担心的是明天怎么走得动。

这时，那位通讯员同志把我们叫起来，要我们洗脚，还说：“用热水烫一下脚，就容易消除疲劳，明天走路就不吃

力。”我们听了他的话，都洗了脚。有两位上海来的女同志走得脚上起了泡。通讯员同志又告诉我们，开头走路，总是要起泡的，但不要弄破它，第二天熬点痛再走。待泡子走破了，干了，脚底就长出一层厚皮，再不会起泡泡了，那时就不怕走路了。

洗过脚，的确轻松一些。再走一天，我脚上也起了泡，以后经过几个阶段真的再也不起泡泡了。走路，也有这些学问，在上海时哪里会想得到。

习 惯 成 自 然

在抗大开学的初期，上海来的同学对吃饭问题顶伤脑筋。当时新四军才到苏北不久，苏北人民被敌伪顽固派搅穷了。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和人民同甘共苦，因此，学校里吃的大部分是杂粮、绿豆、玉米、山芋干、大麦等，米是很少的。上海人夏天吃绿豆汤，有糖有桂花。而这里绿豆是煮成圆滚滚硬硬干的干饭，配的菜又是盐多油少的老韭菜或辣椒，这味道就不能相比了。顶好的就算是“三大饭”了，大米、大麦、大萝粟（玉米）合煮的，但三种不同的粮食煮在一锅里，不免软的软硬的硬。

开头听到开饭哨子响，不免皱起眉头，肚子饿也只得细细嚼上小半碗，勉强咽下去。到晚上就上街买一些大饼、面条吃。有几位上海同学，来时带了一些钱，就上小馆子吃一顿红烧肉。但时间一长，口袋里的钱完了，肚子也有点习惯了，再听到开饭哨子的声音，也觉得杂粮饭是那样香喷喷的，遇上“三大饭”还能吃下两碗。

开头还有一个不习惯，就是早上起得很早。这抗日军政大

学第五分校（总校在延安），生活是军事化的，天没有亮就起床，打背包，背了枪上操场跑步，学军事动作。天又冷，手摸在冰凉的枪上真不舒服。我们是政治队，但一样要学军事动作，晚上同样站岗放哨，开始有些同学想不通，不晓得学军事的好处，但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话讲。直到一九四一年秋天，敌人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及广大人民对敌人展开激烈反扫荡斗争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在抗大学的三下两下军事动作，和习惯了的军事生活，的确大有用处。

想得非常简单

我们那个队，同学中对政治课的兴趣比军事课浓。主要的政治课是：中国革命问题、青年的修养和出路、民运工作。

在青年修养问题学习中，结合了自己的思想检讨，通过学习小组，作了初步的检查，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缺点，自高自大的毛病也有了初步的克服。但认识还是非常肤浅的，认为只要花一二年功夫，就可以锻炼成一个顶呱呱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可以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一扫而空了。这种认识现在想起来多么可笑，多么幼稚，把一个人的改造看得这样简单。

对民运工作一门功课，觉得非常新鲜，很感兴趣，学习始终是认真的，学了也觉得很有用处。但认识同样是肤浅的，学到了一点原理条文，就自满起来，认为一旦下乡工作，就可以此法宝解决一切问题了。后来到乡里真正动手的时候，就认识了现实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必须从头学起，而且要不断地学。

总之，在初参加革命的时候，由于自己认识的水平和政治

水平低，把许多问题都看得非常简单轻易，实际上是肚子里空空的，还满以为自己很不错，“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对联真是很好的写照啊！

母女之间

抗大里女同学有一二百人，分成两个队。大部分是上海来的大、中学生，也有苏北的女学生。女生队一样要学军事，早上出操，晚上站岗。

女生队中有一对母女同学，在学习中母女还比赛谁进步快。但也有几个脑筋旧一点的母亲，从上海赶到盐城来，想拖女儿的腿。

有个女同学，家庭是经商的，那位老板娘也到盐城找女儿。校部招待所的同志热情招待，给她吃大米饭、炒肉丝，但她不吃，要拖女儿一起上馆子。晚上不肯住招待所，要和女儿睡在一起。每夜唠唠叨叨的说：“你是千金小姐，吃这种苦做啥？在家里窗上有一条缝，还要用纸糊住，这里窗上玻璃都碎了，风又这样大；在家饭里有粒谷也要剔掉，这里吃的象什么东西？这种苦你是吃不消的。”

当然，这母亲也不是什么反动分子，但她是尽了一切努力要把女儿拖回去，她对女儿的行动和思想感到不可理解。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日日夜夜，但终于失败了，女儿坚决不回去。最后这位母亲也就知难而退，回上海了。但临走时给了她女儿一个金戒指，叫她“回家时”做路费，母亲走了以后，这位女同学却把金戒指交出来救济了灾民。

这事情到今天已经十年了，这位女同学已经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在上海解放后回家过一次。她母亲现在也进步了，常

对人说：“解放军吃的苦说也说不尽，我这姑娘真有志气。”

十六架敌机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刚吃过中饭，队部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各人只带了武器，连背包也没打。很快就站好队，队长讲了简单几句话：“校部来命令，队伍立刻到城外去，敌人飞机已经到东台了，不要半个钟点就会到盐城。”

学校就在东北城墙脚下，城墙早已拆除了，不用十分钟，全校二千余人全部到了城外。城外也没有防空洞，只有旧的战壕，各队都按照校部指定的地点，分散隐蔽在战壕及坟场下面。

气氛是够紧张的，尤其是我们上海来的新同志，都没有经历过这情景，只在抗大军事课上知道一点防空常识：不要乱跑，卧在隐蔽地方，武器也要隐蔽起来，人与人之间距离要大，可以减少伤亡。就凭这一点常识，照样做了。也有的人过分的紧张，听到旁人说话就叫人家不要讲，好象飞机上会听到似的。有的同学把眼镜也拿下，钢笔也藏了起来，深怕飞机上看到光亮似的。

紧张了一阵，飞机还是没有来，正想松一口气的时候，只听得天空中轰鸣起来，抬头一望，南天上一群敌机，隆隆地向盐城上空飞来。前面一架领队，后面三架一排，共有五排，十六架三个头的轰炸机，到了盐城上空打了一个转，就一架一架的窜下来轰炸，轰炸的目标很清楚是抗日军政大学。炸弹一排一排的扔下来，地上冒起一阵阵的浓烟，其中有三架敌机还绕到我们头上，向我们隐蔽的地带猛扫机枪，可以看出两条闪亮的火舌。

胆子大一点的同学，在战壕里躺着观望敌机，也有坐着看的。可是胆子小的同学都把头伏在壕底里，望也不敢望。等到一阵机枪扫过，排长就到我们旁边来，看看有没有人中弹。

轰炸扫射继续了半个钟头，敌机骄横地向南飞回去了。我们队伍也就集合起来回到学校里。说也奇怪，其中十二架飞机都是对付我们学校的，但我们全校二千余人，一个都没有被炸到射到。另外四架敌机在西门登瀛桥炸民船，死伤十余个老百姓。轰炸一结束，校部首长就去慰问受害的群众。

学校的房子被炸倒了几幢，我们队上有三个班的宿舍都中了弹，我住的那间也挨了炸，打得紧紧的背包，飞到了邻屋房顶上，一只洋磁碗压得象个铁饼，胶皮鞋炸飞了一只，还有一只也被削去了一大块。

几个同学的背包被炸毁了，马上就得到了其他同志的帮助，送给了他毯子等东西。毁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的，也很快就有人送给他。有个同学，送了我一个搪磁的有柄杯子，代替洋磁碗吃饭。

经过这一次轰炸，同志间的友爱团结更加深了一层。我们就利用这时机，组织了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抗日道理，对受难家属进行了慰问。军民关系也更密切了，抗日情绪更高涨了。这一结果，敌人是不会估计到的。

经过这一次的轰炸，更教育了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敌人是时时刻刻都在准备袭击我们，对有些太平麻痹思想的同学，也是一课实际的教育。

小板凳队

抗大同学二千余人，一共编成十三个队，其中两个女生队，

十一个男生队。一、二、三队都是部队里调来的连排干部，打仗有经验，其他队都是新同志。有时为了应付紧张情况，抗大的学生兵也参加打仗。因为保守机密，作战时番号是另定的，不说是抗大的。但抗大同学有个特点，每人背包上绑一个小板凳，为了便于随时随地可坐下来学习，听报告，因此老百姓叫我们“小板凳队”。由于三队在秦南仓打了个胜仗，一队在上冈打了个胜仗，打死了日本鬼子二十余人，“小板凳队”的威名就传开了。

这两次仗，是在敌机轰炸以后，敌人知道大批的炸弹，没有把这革命的学府炸散，就趁新四军主力在外线作战的时候，派了两支轻装部队来袭击我们。一路是从兴化城出发的，进攻盐城西面的要地秦南仓镇；一路是从海边上的合德镇出发的，进攻盐城、阜宁交界处的上冈镇。

我们那个新生队，配合老大哥一队保卫上冈。一队早上先出发，我们下午出发。盐城到上冈有四十五里，我们背了背包、步枪、手榴弹急行军，一个钟点走十四里路。到新兴场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到清脆的重机枪的声音，再走一程反而静寂下来。我们问了一下刚从前线下来回校部报告作战情况的通讯员，说是敌人是打退了，但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时候心里上松弛起来，脚步也没有以前快了，一个钟头只走十一二里，到达上冈镇的时候，天已落黑，在一个祠堂里休息，等队长来传达命令。

半夜里队长开会回来了，队伍立刻集合站队，命令很简单，要我们这个队，组织一个二十个人的勇敢队，到上冈与罗公祠之间的某地去打伏击，配合正面的一队同志作战。勇敢队员要自动报名，上级批准决定。

我当时对上级的号召，怀着两种心情：一方面认为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一方面又感到自己身体正有点病，怕跟不上队伍，影响其他同志作战。因为从盐城出来，半路上就掉了队，落在顶后面，背包还是其他同志帮我拿的。同时又没有作过战，对战场还是有点摸不透底，有点害怕。因此，我没有很快站出来报名。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第一班班长，他是淮海区调来学习的，有些作战经验。他叫王智谋，毕业后在射阳县工作，后来当区长，在一九四四年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在他牺牲的那个乡，群众为了纪念他，改乡名为智谋乡，这是后话。当时他站出来以后，很快就有七位同志站了出来，也有上海来的戴眼镜的大学生。我这时耐不住了，个人的一切顾虑都抛得干干净净，也精神抖擞地站了出去，好象什么病也没有了。

自动参加勇敢队约有三十几个人，队长和指导员研究了一下，要不了这么多，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任务，只选了二十一个人，我因为坚决要去，没有被剔掉。

我们由指导员及一个排长率领，渡过了三条河，走了十来里路，就到了上级指定的伏击地点。在乱坟堆里，我们抱枪而卧。春天的深夜天气很冷，肚子又饿，但大家没有什么畏缩，都兴奋的准备打一次“处女战”。

天色微明，春风阵阵，上冈方面已经打起来了，机枪、步枪、掷弹筒、手榴弹的声音，交织成春晨的交响曲。

可是横在我们面前的河对岸的公路上，别说敌人，连只小狗也不见。我们开始抱怨起来，留在上冈不是一样可以打仗吗？指导员叫我们不要慌，说敌人退却时可能会走这里。

到中饭时候，上冈的枪声也停了，但敌人始终没有在我们

阵地前出现过。

大队部派人来联系了，叫我们立即归队。并告诉我们，进攻上冈的敌人退了，被打死了十多个。我们一队牺牲了四个同学，一队队长陈贤义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上冈，又很快的赶回盐城。整整二十四小时只吃了一顿饭，跑了一百多里路，没有睡一分钟。

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敌人不敢轻易进犯，开始准备“大扫荡”。我们学校开了一次庆祝上冈、秦南仓的胜利，及追悼陈队长等烈士的大会，并动员准备对付敌人的“扫荡”。

在敌人大规模“扫荡”的前夜，我们还是抓紧这空隙时间进行学习。在一九四一年五月，第一期的同学都毕业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有的到部队去，有的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

我们队上留下了十多个同学，分配在学校里做第二期的训练工作。我也留在校内的新生队做教育干部工作。第二期的学习更为艰苦，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斗争中进行的。

郊 外 课 堂

自从敌机轰炸以后，我们早晨就到郊外去，课堂就设在农民的打麦场上，黑板是值日生随身带的。大家的背包、枪、手榴弹都带着，当然小板凳也跟随背包。

上课以前，队长和排长先在四周看好地形，敌机来袭击时，各班就按照指定地点隐蔽。上课时候，黑板挂在农家的墙上，学员一班班排齐了坐下，小板凳加上背包，也很舒服。手榴弹、子弹带挂在胸前，步枪靠着右肩。学员一边听课，一边还做笔记，膝头就当书桌，这种课堂，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处都是一样的。

饭大部分是学校各队炊事房烧好了送来的。当然饭、菜都

冷了，但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吃饱肚子，冷的热的，咸的淡的已经没人去计较了。譬如有些上海来的同学，在家的时候，葱、韭、蒜都一叶不进口的，经几个月的锻炼，大盆的老韭菜也抢着吃了。

有时候离城远了，送饭不方便，就由炊事房同志带了粮食菜蔬与我们一起下乡。但盐城东乡的大庄子很少，而且我们既然是为了防空，在大庄子上也不合适，因此，只得住在三两家的小舍里。锅子小，要煮一百余人吃的饭，就非分五六次煮不行，等到末一锅煮好，上次煮的饭早已冰冷而硬了。为此就把各次煮的饭合在一起拌和，以免有的同志专吃冷饭。

生活检讨会

一到晚上，大家就回到宿舍里。宿舍一律打地铺，一个班一张大铺，下面稻草，上面芦席。学习讨论会、生活检讨会也都在铺上开。中间放张小板凳，凳上放盏豆油灯，灯芯一般都不用灯草，因为灯草烧得快，火头又不大。用棉花捻成的芯子比较经烧，又可以随大随小，有时候没有现成的棉花，就从破棉袄或棉花胎里撕一点下来，反正大家会捻。但也不能太大，因为节约，用油也严格限定的，因此只能围灯而谈，要记笔记就困难了。但一个人就灯做记录，还是可以的。

学习讨论会是经常开的，每天听的课在小组上再研究一番，可以得到更深一层了解。不懂的还可提出来，下次教员上课时再行讲解，有些问题由帮助教员工作的教育干事用墙报形式解答。生活检讨会一星期一次，内容不限于生活方面，学习态度，思想意识检查，都包括在内。开始参加学习的时候，一般都只在生活细节上兜圈子，随着大家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